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点图书

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

崔新健 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点图书

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

崔新健 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崔新健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95 - 1082 - 7

I. 中… II. 崔… III. 外资利用 - 研究 - 中国 IV. 83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975 号

责任编辑: 周桂元

责任校对: 张 凡

封面设计: 郁 佳

版式设计: 董生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379 000 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3.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082 - 7/F · 0909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目 录

绪 论 历史性突破：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概述	(1)
一、1949~1958 年：中国利用外资的积极尝试	(1)
二、1959~1968 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步伐停顿	(4)
三、1969~1978 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推进	(6)
第一章 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由“试验”到“奇迹”	(9)
第一节 “经济特区”：利用外资的试验	(9)
一、利用外资：历史性抉择	(9)
二、利用外资：历史性突破	(10)
第二节 沿海经济开放区：利用外资的推动力	(12)
一、“优惠政策”加速利用外资的步伐	(12)
二、从“点”到“线”利用外资逐步展开	(13)
三、利用外资战略——“以市场换技术”	(14)
第三节 “南方讲话”：利用外资的历史性定位	(14)
一、由“线”到“面”利用外资全面展开	(14)
二、利用外资产生正面效应	(16)
第四节 加入“WTO”：利用外资的新起点	(17)
一、利用外资的新挑战	(17)
二、利用外资的新战略	(19)
三、迈开“走出去”的第一步	(20)
第二章 利用外资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	(22)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趋势	(23)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特征	(23)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带来的新挑战	(25)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利用外资	(27)
第二节 利用外资的国际经验	(28)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	(28)
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概况	(30)
三、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经验与教训	(35)
第三节 中国的改革开放	(37)
一、中国的经济基础	(37)
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38)
三、中国的对外开放	(40)
第三章 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由“优惠政策”到“国民待遇”	(43)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体系	(43)
一、利用外资政策法规体系的内容	(43)
二、利用外资政策法规体系的变化趋势	(45)
三、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体系	(47)
第二节 “优惠政策”：敞开引进外资之门	(49)
一、“优惠政策”及其变化轨迹	(49)
二、“优惠政策”的作用与问题	(51)
第三节 “国民待遇”：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的走向	(53)
一、中国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进程	(53)
二、WTO 框架下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的调整	(56)
三、“国民待遇”：市场化进程与 WTO 框架下的抉择	(60)
第四节 利用外资面临的新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64)
一、国家经济安全——一个日益引起各国重视的概念	(64)
二、利用外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67)
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与举措	(71)
第四章 利用外资的规模：由“零的突破”到“世界第一”	(75)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规模及其变化	(75)
一、全景回顾：30 年利用外资规模变化	(75)
二、1979~1982 年：起步阶段	(78)
三、1983~1991 年：成长阶段	(80)
四、1992~2001 年：提高阶段	(81)
五、2002 年至今：稳步发展阶段	(83)
第二节 “零的突破”与“双缺口”	(85)
一、利用外资的作用——“双缺口”的阐释	(85)
二、“零的突破”有效地弥补了“双缺口”	(87)
三、利用外资规模引起社会关注	(88)

第三节 “世界第一”与“适度规模”	(91)
一、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之争	(91)
二、外债“适度规模”的标准探讨	(95)
三、外商直接投资“适度规模”的标准探讨	(97)
第五章 利用外资的方式：由“合作”、“合资”到“独资”	(99)
第一节 利用国际间接投资的形式及其变化	(99)
一、国际间接投资及形式	(99)
二、国际间接投资的变化	(102)
三、国际间接投资的正负效应	(107)
第二节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及其变化	(110)
一、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及其特点	(110)
二、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113)
第三节 外商：由重点“防范风险”到实施“全球战略”	(117)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影响因素	(117)
二、“合作”：外商防范直接投资风险	(119)
三、“合资”：外商利用中国企业本土资源	(120)
四、“独资”：外商实施其全球战略	(123)
第六章 利用外资的结构：逐渐趋向“优化”	(127)
第一节 外资来源地的构成：变化与影响	(128)
一、外资来源地的构成及其变化	(128)
二、主要来源地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131)
三、外资来源地构成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40)
第二节 利用外资的区域分布：突破区位的“瓶颈”	(143)
一、利用外资的区域分布及其变化	(143)
二、区域视角：我国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的渐进	(146)
三、利用外资区域分布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51)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强化外资流入的产业导向	(157)
一、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	(157)
二、产业视角：我国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的演进	(160)
三、利用外资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65)
第七章 利用外资的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170)
第一节 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	(170)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170)

(19)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171)
(19) 三、中国经验：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	(173)
(20) 第二节 利用外资与技术进步·····	(175)
(79)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175)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178)
(90) 三、中国经验：利用外资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179)
(90) 第三节 利用外资与就业·····	(185)
(99)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185)
(101)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186)
(101) 三、中国经验：利用外资与就业·····	(188)
(101) 第四节 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	(191)
(111)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	(191)
(111)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对外贸易效应·····	(192)
(111) 三、中国经验：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	(194)
(111) 第五节 利用外资与经济体制·····	(196)
(119)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	(196)
(121)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97)
(121) 第六节 利用外资与环境·····	(200)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	(200)
(121)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	(201)
(121) 三、中国经验：利用外资与环境效应·····	(202)
(121) 第七节 利用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	(205)
(121) 一、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安全的效应·····	(205)
(121)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206)
(121)	
第八章 利用外资的战略：由“引进来”到“走出去” ·····	(211)
(121) 第一节 “走出去”战略：形成、背景、支撑·····	(212)
(121) 一、战略的形成：由“引进来”到“走出去”·····	(212)
(121) 二、战略的背景：机遇与优势·····	(215)
(121) 三、战略的支撑：“走出去”的政策法规体系·····	(219)
(121) 第二节 “走出去”实践：现状与历程·····	(223)
(121)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23)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228)
(121) 第三节 “走出去”理论：中国的探索·····	(232)
(121)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32)
(121)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探索·····	(236)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目的与方式	(239)
附录 I 中国利用外资 30 年大事记	(242)
附录 II 1979 ~ 2007 年中国利用外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	(253)
附表 1 1979 ~ 2007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253)
附表 2 1979 ~ 2007 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254)
附表 3 1980 ~ 2007 年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 FDI 流入量	(255)
附表 4 1984 ~ 2007 年主要国家/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变化	(256)
附表 5 1982 ~ 2007 年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257)
附表 6 1979 ~ 2007 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变化	(258)
附表 7 1984 ~ 2006 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地区分布	(259)
附表 8 1979 ~ 2006 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产业结构	(260)
附表 9 截至 2006 年年末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行业结构	(260)
附表 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非贸易性或非金融类）	(261)
附表 11 中国利用外资法规政策索引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69)

绪论

历史性突破：

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概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1993年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流量长期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世界第二的位置，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利用外资的世界奇迹。

回顾中国利用外资30年，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将视线拉回到更为久远的历史场景和事件上。事实上，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曾明确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就积极尝试利用外资，恢复经济建设；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及各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素导致中国利用外资步伐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经过曲折起伏，“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利用外资又重新迈开前进的步伐。溯本求源，延展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长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利用外资历史性突破的标志性界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1949~1958年：中国利用外资的积极尝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当时，全国经济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从新中国建立到1958年底的10年间，我国的利用外资政策是积极而又明确的。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认识到利用外资和侨资对于恢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谈话和制定政策鼓励和吸引外资和侨资，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带领他的领导集体将其利用外资的理论变成了利用外资的实践。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毛泽东访问前苏联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毛泽东多年来利用外资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由此展开。与前苏联的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也持有积极的态度。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

甚至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办合股企业或者租让事业,“就是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世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① 1952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还说,中国要变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两国之间“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②。同年4月,我国政府表示愿意为“与欧洲各国,首先是英国、法国及西欧、北欧等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贡献自己的力量”^③。

自20世纪50年后期开始,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朝缓和的方向发展。在积极推动中苏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在寻求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合作。195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在下院宣布,英国决定单方面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随后,丹麦、荷兰、前联邦德国和法国等国也相继做出了类似决定。由于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领导人心中对待外资的芥蒂一直存在。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④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松对华贸易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未能开展双方的经济合作。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⑤

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尝试利用外资的实践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体现在对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外资的利用。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低利息贷款、通商等协定。根据协定,前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年息1%,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总共从前苏联获得14.27亿美元的贷款,引进了156个项目,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我国通过各种形式引进外资63.4亿美元。^⑥

我国引进前苏联资金除了接受贷款和援助之外,还利用直接投资的形式与前苏联等国家建立合资企业,比如,1950年与前苏联建立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和中苏造船股份公司,1951年与波兰建立了中波轮船分公司,1959年与前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中捷国际海运股份公司,等等。

(2) 对华侨资金的吸收。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很多海外华侨对新中国也是采取观望的态度,对新中国的投资并不活跃,当时国内吸收侨资不及中国香港地区的2%。毛泽东多次谈到要积极引导华侨回国投资,主张制定积极的政策,鼓励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投资,甚至对于如何使用、如何支付利息都有比较细致的考虑。195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

① “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人民日报》,1950年4月5日。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③ 金朝晖:“对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考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⑤ 卿定文:“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⑥ 杨荣坤:《对外开放纵横谈》,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华侨投资 20 年、100 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①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华侨投资，国务院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公司的优待办法》等文件。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励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先后在沿海举办了一些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

(3) 通过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海外华侨建立经济联系，新中国初步建立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基础格局，开拓了对外贸易渠道，对外贸易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1952 年我国对外进出口总额为 19.4 亿美元，1956 年上升到 21 亿美元，1959 年，进一步发展到了 43.8 亿美元。^②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利用外资理论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在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上都有所发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标志着对利用外资的理论的探索。在对外资的认识上，认识到外资是筹措资本的手段，能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提出了“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工厂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的方式；在利用外资的原则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近代以来外资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利”的原则；在利用外资所需的环境上，提出须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③

毛泽东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和观念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通过对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形成发展变化的分析，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原则可以归纳为三点：利用外资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利用外资要讲求互惠互利、利用外资要有明确的范围。^④ 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动机在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需要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来发展经济。除了要改变落后经济状况的动机以外，新中国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政治支持。1958 年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强调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也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资的认识和对利用外资理论的探讨都只处于初步阶段，利用外资主要出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经济政策的考虑。^⑤ 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缺乏战略的眼光，虽然也积极考虑利用外资和外债，但是设定很多先决条件，而且对于外债有恐惧心理；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来源单一，过分依赖某一个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缺乏政策的灵活性。^⑥

建国初期中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建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引进了一批工业项目，填补了很多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0 页。

② 国家统计局：“建国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求是》，1999 年第 21 期。

③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④ 金朝晖：“对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考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⑤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⑥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工业建设的空白,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通过引进项目和创立合资企业,学习到了国外的重要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获得了经济建设所需资金、技术和装备,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虽然这一时期我国与外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数量不多,但是作为利用外资政策的一个方面,其意义不容忽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外资的理论真正地变成了现实。

二、1959~1968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步伐停顿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年间,我国对待利用外资基本持积极态度,虽然利用外资的渠道过于单一,主要依靠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但是利用外资的实践跨出了实质性的步伐。20世纪50年代末,促使我国利用外资的观念由积极向否定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属中苏关系破裂。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同志加兄弟”国家的援助也是靠不住的,还应该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中国利用外资的步伐进入了停顿状态。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并最终导致友好合作关系的破裂。1959年9月,前苏联中止执行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1960年6月至7月,前苏联单方面废除了所有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逼迫中国政府提前偿还债务。由此1953年7月中苏签订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中所确定的前苏联将给予中国总值为30亿~35亿卢布的援助,并援建156项工程,最终并未完全实现。

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不借外债、断绝外援的政策,突出强调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中苏关系破裂使中国国家领导人利用外资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开始强调我国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开始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等人认真研读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同有关同志谈话时,毛泽东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

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态度是否定外资、拒绝外债,但是局部表现为通过变通的方式引进经济建设必需的技术和设备,尤其是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往来比较密切。中苏关系破裂之时,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国内经济极度困难,必须从国外引进必要的技术和设备应付困难局面。这种情况下,我国采取了延期付款等形式购买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花了2.8亿美元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设备。此外,还利用中国银行在海外的外汇存款购买了远洋轮船等我国急需的设备。20世纪70年代前期,又用39.6亿美元从日本、前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化肥、化纤、石化和冶金设备和技术。与西方国家开展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所需的技术和设备。资料显示,1963~1965年我国与前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增强了经济合作,达成了20多项协议,到

1966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史无前例地达到8.971亿美元。^①

这一时期,中国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规模比较大。事实上,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在经济实力很弱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对外提供援助。比如,1950年6月至1953年底,我国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近7.3亿元的物资援助,在1950~1954年,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了价值人民币1.76亿元的物资援助,1956年中国政府又向埃及政府无偿赠送了2000万瑞士法郎以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②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陷入被动,转而积极寻求与第三世界的合作,相继提出了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无私的援助,赢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充分信赖。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1960年11月,中国政府与古巴政府签订了政府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承诺从1961~1965年给予古巴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并决定1961年大量购买古巴出口商品,其中包括食糖100万吨。^③另据统计资料,1967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为19.9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比率的4.5%,1972年,对外援助支出达51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则高达7.2%。^④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的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受国际因素干扰大,在国际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理论发展成曲折之势。二是利用外资理论没有多大突破,主要限于对侨资的探讨。三是利用外资开始向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国务院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等法规对以后利用外资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⑤在利用外资的原则方面,初期反复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但到后期却过分地强调自力更生。^⑥

中国利用外资观念由积极转向消极的原因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中苏关系的破裂促使我国对待外资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至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过多地将利用外资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调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影响;盲目的“大国”意识,使我国不仅拒绝外援,还大规模地实施对外援助;“左”倾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限制了对外开放。^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都在积极地利用外资,而我国却把利用外资列为禁区,其主要原因除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前苏联的背信弃义以及“四人帮”的破坏等客观原因外,在指导思想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因:第一,认为利用外资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则;第二,害怕利用外资会使中国受到剥削和侵略;第三,把社会主义看成纯而又纯的社会。^⑧

① 赵怀普:“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的努力”,《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③ 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④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339页。

⑤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⑥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⑦ 卿定文:“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演变与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4期。

⑧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三、1969~1978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推进

中国利用外资的观念和实践在这10年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波折，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阶段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对利用外资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而且这种对待外资的消极态度不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还转化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实际经济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一个阶段利用外资的态度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时期前半阶段，中国否定利用外资的态度在继续和强化。“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客人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①1972年，中国政府进而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我国外贸部又重申：“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人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②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尽管思想意识和政策导向都是否定利用外资的，但是实际工作中，由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已经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挽救国民经济，不得不采取变通的形式利用外资。我国急需恢复被“文革”延误的生产和经济建设，不得已要引进国外的一些生产设备，即便这样，也尽量避免使用借外债或者引进资本这样的提法。对于利用延期付款等形式，周恩来总理在1973年6月22日会见日本贸易促进会代表团时这样解释：“按照我们的政策，不打算采用贷款，但是可以利用延期付款的方法进口日本的成套设备。”^③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的外汇存款等方式，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42.4亿美元。^④这些引进项目包括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比如武钢1.7米轧机和43套综合采煤机等。

这一时期后半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先行，并形成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基本思路。1975年，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加大了引进技术的力度，还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的方式引进石油化工和煤炭开采的成套设备，并利用这些设备生产的产品来折价偿还外债。这实际上就是补偿贸易，邓小平总结了补偿贸易的三个好处，一是产品能够出口，二是可以带动煤炭、石油行业的技术改造，三是可以容纳劳动力。^⑤尽管此时关于利用外资的政策仍然是封闭的，但是利用外资的实践已经重新起步。

从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短短两

①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②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③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④ 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⑤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看到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困难情况，感觉到了大力恢复经济的紧迫性，也发现了在经济恢复中需要加强的某些薄弱环节，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恢复和开展经济建设，其中也包括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关系。1977年7月，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肯定了过去的延期付款、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的做法。与此同时，外贸主管部门提出了采用来料加工等方法开展对外贸易。1977年底，中央有关领导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和某些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①

1978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外合作的力度，1978年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强调要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李先念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为了减少有关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的负担，尽量多搞些补偿贸易，以减少这些项目的国内投资。”^②当时，中央加大了基本建设的规模，资金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现。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就追加48亿元。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滞胀”之中，急于在国外市场上寻找产品和资金的出路，而我国则重新认识到国外的先进技术、产品和资金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鉴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迫切的内部需要，中央加大了利用外资的步伐，在对外合作方面出现了后来被称之为“洋跃进”的倾向。1978年我国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而且还有50亿美元的意向没有签订完成。冒进的做法令财政预算捉襟见肘，于是，在1978年7月召开的讨论加速经济建设步伐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出现了利用外资进行反思的声音。这次会议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外国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陈云提出了利用外国借款应该按比例、稳妥实施的观点。他认为，向外国借款是可以的，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太多，办不到。有些干部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③

1978年9月，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中表示，引进外资、合资经营都能够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禁区。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就中国对待日本政府贷款的态度表态说：“今后将研究这一问题”。同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会见外国来访客人时也表示：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我们愿意接受一些外国贷款或其他形式的帮助和合作。12月15日，中国外贸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④至此，中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基本思路已经清晰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将对外开放确

①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②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③ 熊亮华：“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与经济工作大转折”，《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④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对于这个时期两个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与观念的变化,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利用外资的理论反而倒退了,产生倒退的原因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国际环境、政治生活分不开的。^① 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时候,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错过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一次大好机会,否则,我国经济可能会更早地实现快速发展。^②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逐步活跃,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形成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局面是水到渠成之势。国际方面,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国际资本的流动加速,投资对象、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已成为全球大势,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正方兴未艾,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我国与日、美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③

这一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利用外资理论应该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前夕这一个时期内正式形成的,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实践与探索对于理论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④ 这个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发展和突破:一是认识到利用外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二是利用外资的形势呈多样化发展,利用外国金融机构贷款、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对外加工等等,都进行了有益尝试。为后来形成多种形式利用外资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⑤ 这个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理论的成果可归纳为四点:一是对国际形势深刻把握的新的理论成果;二是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西方国家资金的实践经验的吸收与借鉴;三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认真反思的新总结;四是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⑥

①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②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③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④ 卿定文:“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理论形成过程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⑤ 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⑥ 卿定文:“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演变与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 4 期。

第一章

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

由“试验”到“奇迹”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之一。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30年来，中国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利用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利用外资包括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本书的阐述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线。我国利用外资从经济特区“试验”起步，逐步全面展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79~2007年，我国协议利用外资金额达19842.9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889.01亿美元。利用外资协议金额和实际金额基本上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31.65%和22.5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达15606.1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66.66亿美元。1993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一直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奇迹”。

第一节 “经济特区”：利用外资的试验

一、利用外资：历史性抉择

中国利用外资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抉择。1978年9月，邓小平就谈到：“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①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近代百年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